

四部刊要／集部・別集類

柳宗元集

一

唐・柳宗元撰

四部刊要／集部・別集類

柳宗元集一

唐 柳宗元 撰



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柳宗元集/ (唐)柳宗元撰. -- 初版.

-- 臺北縣土城市：頂淵，

2002[民91]

一二冊：公分.

-- (四部刊要. 集部. 別集類)

ISBN 957-2020-10-2(全套：平裝)

844.15

90022227

四部刊要/集部·別集類

柳宗元集 (一二冊) 平裝 定價 750 元

撰 者：柳 宗 元

發行人：陳 清 榮

發行所：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出版字號：局版臺省業字第玖肆零號

地 址：台北縣土城市延安街 39 巷 10 號 1 樓

電 話：(02) 82601428 22737213

傳 真：(02) 82601429

郵撥帳號：0784385-1

印刷所：吉豐印製有限公司

版 次：西元 2002 年 9 月初版一刷

全省各大書局均售·如有缺頁破損，請寄回更換

ISBN 957-2020-10-2

本書版權由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轉讓

河東集卷第八

行狀

段太尉逸事狀

段太尉秀實也

狀公元和九年

狀公元和九年又有與史官韓愈

段太尉逸事狀

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

大曆十二年

為涇州

汾陽王

以副元帥

居蒲

是歲正月

刺史

關內河東

副元帥

河中節

王子晞為

度等使治河

中河中

蒲州也

節

王子晞為

書

晞子儀子時

為左常侍

不

領行營節度使

皇朝添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

銘雜題

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

韓曰漢惠帝即位詔有司為高
帝立原廟堂廟高有殿在祀典

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

高童曰虞高辛氏之子會薛虞契列佐命垂統股肱天下張

書元首明義股肱聖德作天而為仁音元臣

統天而受命四姓承聖中邦孫曰舜

神環運炎德復氏焉

前言

柳宗元（公元七七三—八一九年），字子厚，是我國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和著名的思想家。他祖籍河東（今山西永濟），人稱柳河東，曾貶官柳州，因又稱柳柳州。他出身于官宦士紳家庭，二十一歲中進士，二十六歲第博學宏詞科，授集賢殿書院正字，後又任藍田尉，監察御史裏行。貞元二十一年（公元八〇五年），與劉禹錫等一起參加主張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團，升任禮部員外郎。不久，革新失敗，被貶爲永州（今湖南零陵縣）司馬。十年後，改貶爲柳州（今廣西柳州）刺史。又四年，病逝于柳州，年四十七歲。

柳宗元一生，經歷了代宗、德宗、順宗、憲宗四朝，但他的主要活動是在貞元、元和時期。這時經過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，唐王朝已開始走下坡路，爲舊時史家稱道的所謂盛唐時代已經一去不返。這場大亂以後，士紳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對立、士紳階級內部各個階層和各個集團之間的對立，不僅沒有緩和，而且都進一步激化了。藩鎮軍閥依然擁兵割據，並且從河北四鎮擴展到內地。這些藩鎮跨州連縣，「大者連州十餘，小者猶兼三四」，「既有其土地，又有其人民，又有其甲兵，又有其財賦」（新唐書兵志），「各擁勁卒數萬，治兵

完城，自署文武將吏，不供貢賦」〔資治通鑑卷二二三〕，父傳子繼，儼然成了與王朝中央分庭抗禮的獨立王國。在王朝中央內部，宦官專權也日甚一日。他們掌握中央禁軍，左右朝政，威懾皇帝，權傾海內。朝中宦官當權派和地方藩鎮軍閥既有派系，又相互勾結，狼狽爲奸，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。他們橫征暴斂，恣行吞併土地，造成工商蕭條，農村凋敝。在士紳階級（宦官當權派和藩鎮軍閥本身也是大士紳）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下，廣大農民紛紛破產逃亡，農民暴亂不斷爆發。在階級對立激化、唐王朝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，士紳階級中一些有識見的人物，爲了維護唐王朝的統治和士紳階級的長遠利益，起而要求抑制宦官和藩鎮的特權，維護以皇帝爲首的中央集權和國家的統一，革除一些喪失民心的弊政，使勤苦人民的沉重負擔有所減輕，以利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恢復發展。柳宗元在順宗時和王叔文等一道所進行的政治革新，就是這種特定歷史環境的產物。

德宗貞元年間，柳宗元在任監察御史裏行時，就和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結下了深厚友誼。王叔文當時爲東宮皇太子李誦的侍讀，經常利用機會和太子議論朝廷弊政，希望太子在即帝位後能有所改革。太子李誦對王叔文的政見頗爲賞識，所以當貞元二十一年（公元八〇五年）正月繼承德宗李适即帝位以後，立即起用王叔文、王伾等革新派人物。柳宗元被擢升爲禮部員外郎，深受王叔文的器重，是革新派的核心人物。他們執政後，便實行一

系列的革新措施，如罷黜罪惡昭著的貪官污吏，取締劫掠民財的「官市」和「五坊小兒」，免除正稅以外的苛捐雜稅，把長期被藩鎮壟斷的鹽鐵轉運大權收歸中央，釋放部分宮女和女樂，裁減閑雜人員，並着手接管宦官兵權（因遭抵制未能實現），等等。這些措施，打擊了以宦官和藩鎮為代表的腐朽勢力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。但是，由於宦官和藩鎮的勢力相當強大，革新派缺乏廣泛、堅固的社會基礎，所以這次革新運動在他們的聯合反撲下，很快就夭折了。以宦官俱文珍（即劉貞亮）為代表的宦官勢力，和以韋皋（劍南西川節度使）為代表的藩鎮軍閥勢力勾結起來，逼迫順宗李誦把皇位讓給太子李純（憲宗）。接着便對革新派進行迫害，王叔文被殺，王伾被逼死，柳宗元、劉禹錫等八人被貶謫為邊遠諸州司馬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「二王八司馬事件」。

政治上的失敗和被貶逐，在柳宗元的生活道路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。在這以前，年青的柳宗元在政治上頗有一番抱負，嚮往於「勵材能，興功力，致大康于民，垂不滅之聲」（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）。在理想幻滅以後，他便把自己的精力主要轉到了思想文化領域，認為「賢者不得志于今，必取貴于後」（寄許京兆孟容書），渴望「能著書，斷往古，明聖法，以致無窮之名」（與顧十郎書）。他發奮鑽研經史諸子，「讀百家書，上下馳騁」（與楊京兆憑書），寫自己的體會，「以志乎中之所得」；遇到荒謬之處，他就常常「勇不自制」地進行批判，

「以救世之謬」(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)。他的文學性的散文和詩歌，大多是有感而發，或揭露社會不平，同情勤苦人民的疾苦；或諷時傷世，矛頭實指向腐朽勢力；或「長吟哀歌，舒泄幽鬱，因取筆以書」(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)，以寄托他的悲憤。長期的貶謫流放生活，使他比較深刻地觀察到社會的不平，體驗到勤苦人民的疾苦，從而使他的作品有較豐富的思想內容。他留傳下來的七百多篇作品，絕大多數是在貶官以後寫的。其中有不少優秀篇章，在我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一直閃耀着光芒。

在政治思想方面，柳宗元主張融合先秦以來各家的政治學說，但他最推崇的是「堯、舜、孔子之道」。他的政治理想，是所謂「立仁義，裨教化」，「唯以中正信義爲志，以興堯、舜、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」(寄許京兆孟容書)。他表示自己「好求堯、舜、孔子之志唯恐不得」，「遇行堯、舜、孔子之道唯恐不慊」(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)。然而，他並不專宗一家，而是認爲楊、墨、申、商、刑、名、縱橫、釋、老等各家學說「皆有以佐世」，主張「咸伸其所長，而黜其奇袤」；他認爲這些學派都是「孔氏之異流」，「與孔子同道」，主張把這些學說「通而同之，搜擇融液」，使之完全符合于「聖人之道」(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)。

柳宗元反對藩鎮割據、主張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，突出地反映在他的著名論文封建論中。他總結了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和分封割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，說明只有實行郡縣

制，廢除「繼世而理」的分封世襲制，才能作到「有罪得以黜，有能得以賞」，才能「使賢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」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。他把擁兵自重的藩鎮斥之爲「虐害方域」的「桀猾」，「叛將」，有針對性地提出「善制兵，謹擇守」的建議，主張把兵權和郡縣官吏的任免權集中於王朝中央。

柳宗元主張任人唯賢，反對任人唯親，特別是反對宦官專權。在六逆論中，他批判了左傳把「賤妨貴，遠間親，新間舊」看作「亂之本」的傳統觀念，反對用人看貴賤、親遠、新舊，主張只根據「賢」「愚」作標準。在送崔子符罷舉詩序中，他主張選拔人才時不僅根據辭章，還必須「觀其行，考其智」，看是否德才兼備，可以「化人及物」。他認爲宰相的一個重要任務，就是廣泛地「擇天下之士，使稱其職」（梓人傳）。在晉文公問守原議和桐葉封弟辯中，柳宗元還借題發揮，反對宦官參政和專權。

柳宗元早年懷着「致大康于民」、「利安元元」的抱負，被貶逐以後所盼望的仍然是「生人之性得以安，聖人之道得以光」，並且以「仕雖未達，無忘生人之患」與朋友共勉（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）。他嚴厲抨擊貪官污吏們對勤苦人民的騷擾，要求給他們「蕃生」「安性」的權利（種樹郭橐駝傳）。在捕蛇者說和田家等詩文中，他深刻地反映了勤苦人民的疾苦，並寄予同情。針對當時「賄賂行而征賦亂」的不合理現象，他主張「定經界，覈名實」，實行「均

賦」，適當減輕貧戶負擔，增加富戶賦稅，以利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發展（答元饒州論政理書）。這種主張，雖然只是反映了中小士紳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，但仍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。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時，在他的職權範圍內，也曾經作過一些對勤苦人民有利的事。

在哲學思想方面，柳宗元的自然主義和無神論思想，在我國哲學史上有重要的貢獻。

唐代中葉哲學上的自然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，主要是圍繞着「天人之際」即人和天的關係問題而展開的。當時流行的神學天命論思想，適應宦官、藩鎮爲代表的腐朽勢力的要求，有利于維護他們的特權和既得利益，而自然主義和無神論思想，則是革新派進行改革的思想武器。

柳宗元繼承並發揚了荀況、王充等人「元氣」一元論的自然主義思想，認爲「天」同瓜果、草木等自然界一切物質的東西一樣，是由渾沌的「元氣」構成的，一切都統一于「元氣」，不存在離開「元氣」而獨立存在的有意志的「天」（天說）。他指出「天」是「無營以成」，「無功無作」，是「陽氣」的無限積聚而成，陰陽二氣在無邊無際的宇宙間相互作用，「吁炎吹冷，交錯而功」，推動着宇宙的運動發展（天對）。在非國語三川震一文中，他駁斥了把地震看作

「天人感應」的胡說，指出天地山川、陰陽二氣都是「自動自休，自峙自流」，「自門自竭，自崩自缺」，「或會或離，或吸或吹」，地震就是在這運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種自然現象，就好像蒸氣的「涌溢蒸鬱」和水力的「衝盪潰激」一樣。這些試圖從自然界本身來說明自然界運動的觀點，含有樸素辯證法的因素，是非常可貴的。

柳宗元認為自然界的「天」和社會人事「各行不相預」（答劉禹錫天論書），人的吉凶禍福，社會的興衰治亂，都非「天」所能主宰，而是「功者自功，禍者自禍」（天說）。他還認為，要「變禍爲福」，決不能依靠「天命」，而是「在我人力」（愈膏肓疾賦）。在非國語中，他以大量篇幅批判了國語一書所宣揚的天命論，詳盡地闡述了他的無神論思想。他甚至在給皇帝歌功頌德的文章中，也大膽地駁斥了董仲舒等人宣揚「天人感應」的符瑞說是以「淫巫瞽史」之言來「誑亂後代」，並且指出皇帝「受命不于天，于其人」，「受命于生人之意」，否定「君權神授」的愚民說教（貞符）。在斷刑論、時令論等著作中，他還深刻揭露了「賞以春夏，刑以秋冬」那種把刑政制度神權化的荒唐。

對於歷代極權統治者宣揚天命論的愚民目的，柳宗元也作了揭露。他指出：「力足者取乎人，力不足者取乎神。」（非國語神降于莘）「古之所以言天者，蓋以愚蚩蚩者耳。」（斷刑論）

在社會歷史觀方面，柳宗元認為，歷史的發展，既非由「天」意決定，也不是「聖人」的意志所能左右，而有其客觀的必然趨勢。在封建論中，他以進化的歷史觀分析了人類社會的發展，指出分封制的產生「非聖人意也，勢也」。他認為郡縣制之取代分封制，是不可改變的客觀趨勢。當然，由於歷史條件和出身的局限，他不可能揭示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和客觀規律，他的歷史觀仍然是唯心主義的。從封建論和貞符等文看，他所說的「勢」，實際上是「生人之意」的另一說法。他把「生人之意」看作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，而不懂得決定社會發展的歸根到底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。但應指出，他在當時能提出上述觀點，否定「天」和「聖人」創造歷史，也是難能可貴的。

在我國文學史上，柳宗元佔有重要的地位。無論是在文學理論或文學創作上，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

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之一，對當時文風的改革起過重大的推動作用。唐代古文運動，是一次提倡樸實流暢的散文、反對辭藻華麗內容空洞的駢文的文學革新運動。柳宗元針對形式主義的駢儷文風的流弊，提倡「文者以明道」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），強調文章要「輔時及物」（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）。他說：「文之用，辭令褒貶，導揚諷諭而已。」（楊評事文集後序）這就是說，要用文學的大作用來歌頌贊揚美好的事物，批判諷刺醜惡的

事物。他指出，不顧內容，片面地講求辭藻華麗，就等於「用文錦覆陷阱」，是要害死人的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注重文采，認為「言而不文則泥」，文采是「固不可少」的（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）。這表明了他主張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、內容與形式的統一。當然，他所主張的思想性，從本質上說是為發揚人性理念的。他所說的「明道」或「輔時及物」之類，指的就是要闡明堯、舜、孔子之道，要求文章能觸及時事，輔助朝政，以維護返於清明的統治。此外，柳宗元對作家思想品德的修養問題，寫作的態度問題，繼承與創新問題，文學源流與風格問題，藝術技巧問題，等等，也都發表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意見。

柳宗元的文學創作，內容豐富，形式多樣。他把文章大別為兩類：「辭令褒貶，本乎著述」；「導揚諷諭，本乎比興」。並認為對這兩方面，古來文人「恒偏勝獨得，而罕有兼者」（楊評事文集後序）。事實上，他自己就二者兼能，既長于著述議論，又長于比興諷諭。他根據內容的需要，創造性地運用文學形式，在藝術上有較高的成就。

柳宗元的寓言散文，一般都短小精巧，含意深刻。他通過描寫老鼠、鼯、蝮蛇、尸蟲、蝮蛇等形象，揭露當時社會各種醜類的可憎面目，嘻笑怒罵，痛快淋漓地加以諷刺和鞭撻。他把主要鋒芒指向那些竊據要職的宦官及其所豢養的幫凶爪牙，指斥他們「搖動禍機」，「譖下謾上」（罵尸蟲文），「陰妬潛狙」，「賊害無辜」（宥蝮蛇文）。他有一些寓言，通過

描寫麋、驢、「海賈」、「溺者」等故事，幽默地對人們進行諷諭勸戒，意在言外，至今猶發人深省。寓言文學在戰國時期已有較大發展，但那時還只是在文章中用寓言故事作比喻，很少單獨以寓言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出現。柳宗元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成就，使寓言完全形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，這是他的一個貢獻。

柳宗元寫的文學性傳記散文，大多取材於鄉野農民，如種樹郭橐駝傳中的郭橐駝，捕蛇者說中的蔣氏，梓人傳中的楊潛，童區寄傳中的區寄，等等。他通過描寫這些人物，來寄託自己的政治主張，也不同程度地揭露了當時尖銳的派系對立。儘管這些作品仍有其局限性，但勤苦農民的形象比較多地被寫進文學作家的傳記散文，反映了柳宗元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，這可以說是繼司馬遷史記之後的一個發展。

柳宗元的遊記散文，也很有特色。他對山水自然景物的描繪，準確精細，富有生機，能給人一種自然美的感受。他往往借景抒情，以寄託自己懷才不遇被貶逐遠荒的悲憤。

柳宗元在形式多樣的散文中，抒發他被貶逐後憂鬱憤懣之情的佔有相當數量。這些作品雖傷感情調較重，但其中有一些作品，在藝術技巧上是有可取之處的。例如愚溪對、答問等篇，他以「愚」「拙」自命，語多憤激，諷時傷世，並自慰自勵，作品構思巧妙，文辭優美。他用騷體寫的弔屈原文，亦以自弔，借懷古烈以明心迹。懲咎、閔生、夢歸諸賦，悲遠謫，懷

故都，低迴鬱結，悽切動人。嚴羽說「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」（滄浪詩話）。由於柳宗元與屈原有着類似的生活遭遇，他以屈原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楷模，因而他效屈騷作賦，就能與那些「引吭伴悲，極其摹仿」的人所作的賦有着根本的不同。

柳宗元不僅是傑出的散文家，而且也是著名的詩人。他留下的詩篇，數量雖不很多（二百六十多首），但造詣很深，無論古體或近體，都有一些佳作和警句。他的詩，平淡自然，明淨簡峭，感情真摯，耐人尋味。蘇軾說柳詩「溫麗靖深」，「似淡而實美」，「發纖穠於簡古，寄至味於淡泊」，是道出了柳詩的特色的。

柳宗元是歷史上有貢獻的文學家、思想家，但終究是一千一百多年以前士紳人家出身的文人，他不能不受時代和出身的局限。翻開他的全集，我們固然可以看到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應酬之作，內容無甚可取；就是在優秀的作品中，也明顯地看到時代和出身的烙印。比如他爲了抑制豪族大地主的兼併活動，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中提出了改革「兩税法」實行「均賦」的要求，以便使貧者、富者能合理地負擔賦稅，但他又認爲「富室，貧之母也，誠不可破壞」。這就是他士紳出身本性的反映，說明他的改革是以不「破壞」「富室」爲前提的。又如他對於宇宙本原的認識，對「天人感應」說的批判，都堅持了自然主義觀點，但在對佛教的態度上，却没有徹底堅持自然主義無神論觀點。對於他的好佛要做具體分析，因爲他

在被貶官後找不到出路，無可奈何地想從佛學中去尋求精神上的安慰，實際上他並不是真正篤信佛教教義，佔主導地位的仍然是自然主義無神論思想。但不管怎樣，柳宗元好佛，不能不削弱其自然主義無神論的表現色彩。這些局限性，我們只有從柳宗元所處的時代和他所屬的出身去觀察，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。